



大鳳凰

新批评文丛

陈思和◎主编

无法命名的个人

杨庆祥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火凤凰
新批评文丛

陈思和◎主编

无法命名的个人

杨庆祥／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SHANX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GROUP
BEIYU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法命名的个人 / 杨庆祥著. —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7.1

(火凤凰新批评文丛 / 陈思和主编)

ISBN 978-7-5378-5083-4

I. ①无… II. ①杨…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评论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07142号

书名: 无法命名的个人

著者: 杨庆祥
责任编辑: 刘文飞

书籍设计: 张永文
印装监制: 巩 璠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编: 030012

电话: 0351-5628696(发行部) 0351-5628688(总编室)

传真: 0351-5628680

网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销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700mm×1000mm 1/16

字数: 198千字 印张: 13.25

版次: 2017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7年1月山西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78-5083-4

定价: 30.00元

火鳳凰

巴金

为第二套《火凤凰新批评文丛》而作

去年，北岳文艺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续小强先生来上海找我，希望我为出版社策划两套书，一套是贾植芳先生全集，另一套就是青年批评家文丛。对于前一套书我颇感兴奋，贾先生去世已经五年，再过两年就是他老人家的百年诞辰，北岳文艺出版社作为先生的家乡出版社，能够做此善举，是我极为高兴的事情。后一套书却让我多少有些感慨。小强先生希望我用“火凤凰新批评文丛”的名义来编这套书。“火凤凰”是我当年策划一系列人文批评丛书的品牌，但时过境迁，当初推出第一套“新批评文丛”已经是二十年以前的事情了。小强先生是“80后”的青年，他居然还能想到二十年前曾经在出版界发生过影响的一套丛书，希望能够接着这个出版道路走下去，激励今天的青年文学批评家。我觉得我没有理由谢绝他的这番好意。于是就有了这一套青年批评家的丛书。

我为此又特意翻阅了1994年出版的第一套“火凤凰新批评文丛”。前面除了有巴金先生的题词和任意先生设计的徽标以外，还有一篇徐俊西先生写的序言。序言里有这么一段话：据云，他们编辑《火凤凰新批评文丛》宗旨有二：一曰“在滔滔的商海之上”，建立一片文学批评的“绿洲”；一曰“文坛空气普遍沉闷的状况下”，弘扬当代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徐俊西先生是我的老师，他这里所指的“他们”，就是我和王晓明两个策划者，这里所说的“宗旨”，肯定也是我们当时讨论的话题。但我现在一点儿也想不起来在哪篇文章里写过这样的话。我原

先记忆里似乎为这套文丛写过一卷头语，但现在翻阅一遍也没有找到，也许是我曾经写了，后来没有用上，只是给徐老师写序时做了参考。所以，徐老师文章里打了引号的那些意思，可以定论为我们当时筹办凤凰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策划多种出版物的基本宗旨。

现在已经二十年过去了，我们整个文化工作在经济上是阔气多了，高校系统拨了大量的经费资助学术著作出版，各种文化基金、出版基金也都接受学术著作的出版补贴。所以现在高校里的青年教师要出一本书并不困难，但真正的困难还是存在的，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当前一本文艺批评的著作能否产生它应有的社会影响和学术影响。这个问题直接影响到青年批评家的专业思想以及价值观。

1980年代，文艺批评是显学，尤其是1985年以后，文艺批评承担了很重要的社会功能。当时整个文学艺术正处于一个逐渐摆脱政治体制制约，开始自觉、自主、自在的审美阶段。所谓自觉是指文学艺术审美价值的内在自觉，自主是指创作主体独立的精神追求，自在是指文学艺术作品在文化市场上接受检验、寻求合理生存的社会效应。这是中国当代文学艺术创作的重要转变，对后来的文学艺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时人们在主观上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而转变中的文艺创作需要理论支撑才能显现出它的合法性。1985年的方法论热潮正是适应这样的文化形势的需要而蓬勃开展起来，一批年轻人懂外语，面向世界，如饥似渴地学习、引进西方各种理论思潮，消解原来一元化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戒律，与文艺创作互相呼应，对实验性、探索性、先锋性的文艺创作给以及时的解读。记得我当时在《上海文学》杂志上发表过一篇《谈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演变》的文章，从“五四”前后谈到当下西方现代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相融汇的可能性。那时我读书并不多，论述也有点勉强，学术性是谈不上的，但是在一批作家中间引起过强烈反响。有一个朋友说，那不是你的文章写得好，而是他们（指作家们）需要你这样的说法。我以为这个朋友说得对，文学批评理论就是要在时代、文化发生转变的时候，及时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通过解读某些创作现象来阐释事物发展的规律。这样的批评才会引起社会的关注，1980年代刘再复先生的一本《性格组合论》可以成为畅销书，在今天真是不可想象的。

这样一种文艺创作发展的需要，使文学批评的主体力量从作家协会系统逐渐转移到高校学院，一批研究现当代文学、文艺理论的大学教师逐渐取代了原来作协的文艺官员、核心报刊的主编。本来文艺批评应该有更大气象产生，但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随着1990年代初的政治空气和经济大潮的冲击，学院里从事批评的青年教师们遭遇到双重压力。当时真正的压力还不在主观上，因为学院批评与政治权力保持相对距离，在主观探索方面仍然有一定的空间，但是客观上却遭遇了市场的挑战。出版业的萧条和倒退，迫使原先构建的批评家工作平台纷纷倒闭或者转向，出版人仿佛在惊涛骇浪里行舟，都有随时翻船的恐惧。不赚钱的学术著作，尤其是文艺批评论文集，自然无法找到出版的地方。学术研究成果既然不能转换为社会财富，必然会影响主体热情的高扬和自觉，导致对专业价值的怀疑。那时候高校考评体制还是传统学术型体制，青年教师如果不能顺利出版著述，其职称评定、福利待遇以及社会评价都受到影响。我在1993年策划《火凤凰新批评文丛》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客观形势之上，所谓逆风行驶。我当时就想试试，到底是读者真的不欢迎文艺批评，还是出版社被市场经济大潮吓慌了手脚而不肯作为？我与一些受到人文精神鼓舞的出版社同道们一起分担了这个实验，实践下来的结果是好的，书虽然有了一些经费补贴，出版社不至于亏损，但是销售和宣传的结果，反而有所盈利，《文丛》最后几本的出版已经不需要资助了。我比较看重的是这套丛书里几位青年批评家的著作，如邵元宝、张新颖、王彬彬、罗岗、薛毅等几位青年才俊的论文集，如果说，这套丛书多少为作为全国批评重镇的上海批评队伍建设做过一点儿贡献，也就是不失时机地稳定了这批青年评论家的专业自信。后来几年里我又策划了《逼近世纪末批评文丛》（山东友谊出版社），继续做了这样的工作。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套丛书的意义还是超出了我当时的期望，不仅仅是对几位青年朋友产生影响，也不仅仅是对上海地区的文学批评产生影响。续小强先生在二十年之后还想借重这个出版品牌来推动青年批评家著作的出版，就是证明之一。不过如我前面所说，现在青年批评家面临的问题，与当年的问题并不相同，批评的处境也不同。现在，关于要加强文艺批评的主流声音一直不断，大媒体报刊也相应地设

立批评专页的版面，稿费据说不菲，在高校、出版系统申请出版批评文集的经费也不特别困难。那么，今天的困难在哪里？我个人以为，恰恰是前面提到的编辑“火凤凰”的两个宗旨中的一个：批评家作为知识分子独立主体的缺失，看不到文艺创作与生活真实之间的深刻关系，一方面是局限于学院派知识结构的偏狭，一方面是学院熏陶的知识者的傲慢，学院批评无法突破知识与立场的局限而深入到真实生活深处，去把握生活变化的内在规律，而是把时间精力都耗费在轰轰烈烈的开大会、发文章、搞活动、做项目等等，尽是表面的锦团花簇而缺乏深入透彻地思考生活和理解生活。其实，批评家最重要的是需要有宽容温厚的心胸、敏感细腻的感觉，以及坚定不妥协的人文立场，才能发现尚处于萌芽状态的新生艺术力量，与他们患难与共地去推动发展文学艺术。在我看来，今天我们面临文化生活、审美观念、文学趋势之急剧变化，一点也不亚于1980年代中期的那场革命性的转型。但是，现在文艺探索与理论批评却是分裂的，探索不知为何探索，批评也不知为何批评，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文艺批评怎么能够产生真正的力量呢？所以我今天赞同续小强先生继续编辑出版《火凤凰新批评文丛》，但所希望的，不在多出几本批评文集，更不在乎多评几个职称，而是要培养一批敏感于生活、激荡于文字、充满活力而少混迹名利场的新锐批评家。

这是我的愿望。写出来与青年批评家们共勉。

陈思和

2014年3月3日于鱼焦了斋

庆祥2004年北上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读书，拿到硕士和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他先后获得本专业最高学术奖“唐·青年文学研究奖”和《人民文学》年度青年批评家奖、《十月》青年作家奖，成为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一批“客座研究员”，出版了数部学术和批评著作，担任最年轻的“茅盾文学奖”评委。2015年推出的《“80后”，怎么办？》一书，在青年人中引起很大的反响。他还在人民大学组织了一个面向全国青年作家和批评家的“联合文学课堂”，被视为“80后”批评家中的核心人物。一个年轻文学从业者所梦寐以求的人生目标，他在留校后的短短六年就实现了。

读研究生期间，庆祥专心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写出了一批视野开阔、水平很高的长篇学术论文，如《如何理解“80年代”》《路遥的自我意识和写作姿态——兼及1985年前后“文学场”的历史分析》《八十年代：“历史化”视野中的文学史问题》《在“大历史”中建构“文学史”》《审美原则、叙事体式 and 文学史的“权力”——再谈“重写文学史”》《新星与“体制内”改革叙事——兼及对“改革文学”的反思》等等。《路遥的自我意识和写作姿态》是他的成名作，也是被青年同行引用较多的文章，我倒觉得《审美原则、叙事体式和文学史的“权力”》这篇文章创新点更多，有不少没有因时间流逝而变为过去的观点。庆祥这批论文，已经显示出他长于建筑论析框架、文思细密周到

和分析透彻的特点，而且一些观点并不展开，有意留出一点点余地。在读书期间，不少人注意到他心智早熟，人情练达，对人世、对文章都有自己的拿捏及分寸，但内心却是正直和有骨气的特点。这种秉性，自觉和不自觉地潜入到当时的研究工作之中，也在后来担任大学教职和各种社会关系中发生着作用。

近年来，基于要做“同代作家的批评家”的愿望，他把更多精力转向了现场批评。不仅出席各种作品研讨会，还组织对青年作家的作品展开讨论，尤其注意去挖掘提携还未真正成名的年轻写作者。后一种工作，自然费力不小，除组织活动，还要亲自动手写评介文章，并做一定的宣传。收入本书的批评文章，我有些没有读过，但由此看出庆祥对青年作家倾注的热忱，以及对他们未来创作抱有的希望。我想就读过的《死去了的小资时代》《历史重建和历史叙事的困境——基于〈天香〉〈古炉〉〈四书〉》的观察》《在天空中凝结成一个全体——〈凤凰〉的风景发现和历史辩证法》等文章略为谈点看法。第一篇是以作品带问题的方式，对李陀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大家都倾向于把《波动》看作那个年代的“先驱者作品”，但通过对小说细读，庆祥发现潜藏在文本深处的“小资情调”却被忽略掉了，而这种情调，恰恰又是与“五四”文学革命、19世纪人道主义思潮等等混合在一起而成为更重要的思想资源。因此，不能忽视这种资源对“新时期文学”的启发带动的价值，尤其不能忽视对政治重评维度之外的历史丰富性的认识。《历史重建》一文批评了几位重要作家创作上存在的问题。《凤凰》则借细腻、深入的诗歌阅读，讨论了作者如何将诗歌变成一种有效的历史分析的还原过程。在他看来，“工地”显然被作者扩充伸展成了一个极有价值的“历史隐喻”。这些批评文章，还遗留着文学史训练的痕迹，但更愿意带着所批评的作家身上的体温，和一种与上一代作家批评家有所不同的当代感来建构问题，展开思考。

文学在历史流变中的症候和可能不一而足，但有心的读者，读过庆祥的这本评论集，一定会心有所感而思有所悟。

程光炜

2015年12月16日

辑一 / 001

死去的小资时代

——读《〈波动〉序》兼与李陀商榷 / 003

历史重建及历史叙事的困境

——基于《天香》《古炉》《四书》的观察 / 011

“在天空中凝结成一个全体”

——《凤凰》的风景发现和历史辩证法 / 026

无法命名的“个人”

——由《隐身衣》兼及“小资产阶级”问题 / 042

从小资产阶级梦中惊醒

——张悦然《家》中的历史意识和主体想象 / 056

分裂的想象和建构的可能

——当下中国的文化主体和文化症候 / 070

辑二 / 077

二十年中国史与徐冰的“凤凰” / 079

男人们，请不要再打扰女人

——细读蒋一谈的《栖》 / 085

出梁庄，见中国

——读《出梁庄记》 / 096

从成长中解放

——《80后短篇小说选》序 / 104

日常书写的直接性

——关于马小淘考 / 109

抵抗的“假面”

——关于“韩寒”的一些思考 / 115

小说即“往生”

——读蔡东 / 125

新世纪诗歌写作的几个问题 / 133

在自然和肉身之间

——关于李少君的诗歌 / 139

回到现场的精神角力 / 148

辑三 / 153

杨庆祥：80后是失败的一代吗？

——答《南方都市报》 / 155

“中国当下是最有可能出伟大作品的时代” / 165

文学生态与“深圳书写”

——杨庆祥香港专访 / 181

后记 / 194

死去了的小资时代^[1]

——读《〈波动〉序》兼与李陀商榷

“肖凌是个小资。”^[2]

李陀在《波动》的序里给主人公肖凌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阶级定位。为了突出这一点，李陀在文中再三强调：“女主人公肖凌就是一个典型的小资，不过她是个‘文革’时代的小资，是当代小资的一位前辈。”李陀的这个判断其来有自，在李陀看来，肖凌作为当代小资的前辈，其身上有典型的小资气质，这一小资气质尤其表现在她的审美趣味上：《月光奏鸣曲》、洛尔迦的诗歌，雪白的连衣裙，还有红茶和葡萄酒。而在另外一个层面上，作为一个特殊时代的小资，肖凌又呈现出特别的向度，那就是“强烈的不安全感”和“坚韧又十分简单幼稚的虚无主义”。

003

我同意李陀的上述观点，并以为他抓住了一个非常重大的理论问题，也就是小资产阶级在中国的历史性和当下性问题。实际上，在李陀的整篇文章中，他一直试图从这两个角度——历史性和当下性——对中国小资产阶级的起源、发展和当下迁延进行全面的分析。李陀显然意识到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经典理论框架，并将改变我们的文化构成，也就是说，小

[1] 李陀：《〈波动〉序》，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该序又以《“新小资”与文化领导权的转移》之名发表于《天下》2012年第3期。

[2] 同上。

资产阶级已经从藏匿之所现身并凸显于我们面前——小资产阶级构成了一个问题。

—

让我们继续抓住肖凌这个典型小资不放，或许可以展开不同角度的讨论。首先要追问的是，除了肖凌之外，《波动》中还有没有别的小资？如果按照上述李陀的标准，我觉得至少另外两个女性也可以放到小资的行列里：林媛媛和发发。这两个女性在小说中占了不少篇幅，尤其是林媛媛，她最后离家出走的情节构成了小说一个小小的高潮。这两位女性身上的小资趣味甚至比肖凌还要重，发发的出场伴随的是几个非常小资的动作：吐出一个又浓又大的烟圈，扭着屁股，同时还关心地打听北京的流行服饰（裙子的长短问题）。而林媛媛则与发发形成鲜明的对比：天真、不谙世故，是一个还生活在父亲保护下的女学生模样。如果我们将这三个女性并列来看，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这三个女性构成了《波动》对于小资女性的三种不同的想象：林媛媛是还在成长中的小资女性，发发是一个在道德上显得非常暧昧，带有一点堕落色彩的小资女性——她让我不由得想起茅盾笔下的孙舞阳。而肖凌，从整个小说的叙述来看，是一个呈现出复杂“内面”的小资。在这个意义上，北岛选择肖凌为作品的主人公颇有深意，同时，李陀指认肖凌——而不是林媛媛和发发——为该时期小资的典型代表显然也值得琢磨。也就是说，同样具有小资气质，为什么肖凌具有优先权？除了李陀提出的“强烈的不安全感”和“坚韧又十分幼稚的虚无主义”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别的东西？

实际上，如果从“不安全感”来说，《波动》中的任何一个人似乎都生活在强烈的不安全感中，这种“不安”对应了“文革”这个特殊历史时期的心理氛围；如果从“虚无主义”这个角度来看，发发和白华的虚无主义似乎比肖凌更为彻底和绝望，至少在肖凌这里，她最后还是相信了爱情，尽管这场爱情是一个悲剧。在我看来，肖凌最为独特之处不在于这种虚无主义，而恰好是意识到了这种虚无主义之后

的一种自觉抵抗。小说中有一段对话至关重要：

（肖凌）“请你告诉我”，她撩开垂发，一字一字地说，“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是值得相信的呢？”

我想了想。“比如，祖国。”

“哼，陈词滥调。”

“不，这不是个用滥了的政治名词，而是咱们共同的苦难，共同的生活方式，共同的文化遗产，共同的向往……这一切构成不可分的命运，咱们对祖国是有责任的……”

“算了吧，我倒想看看你坐在宽敞的客厅是怎么谈论这个题目的。你有什么权力说‘咱们’？有什么权力？”她越说越激动，满脸涨得通红，泪水溢满了眼眶。“谢谢，这个祖国不是我的！我没有祖国。没有……”

（《波动》，第23页）

我以为这段对话的意义不仅仅是展示了肖凌的虚无主义思想以及她和杨讯之间的重要分歧，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言说方式”和“行为方式”，暗示了肖凌的与众不同，也就是说，她是通过对一些重大问题（不仅仅是生活上的小情小绪）的思考和辩论来凸显其小资产阶级身份和意识的。肖凌与文中的另外两个小资林媛媛和发发的最大不同正在于此：肖凌经历了一种非常重要的小资产阶级自我意识觉醒的过程。而这一自我意识的觉醒，在林媛媛、发发甚至是杨讯的身上都没有发生，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通过文中类似的此类对话，我们可以看出来，肖凌的虚无主义是多维度的，她的虚无主义处于“相信——幻灭——希望”的历史链条中，也就是说，在肖凌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文革”后一代小资的成长史，这部成长史，与中国当代史密切相关。我们应该还记得在1950年代有“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批判运动，中国的当代想象很大程度上建基于对小资产阶级的改造、排斥、压抑，而“文革”的终结，使得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想象找到了一个可以重新浮出历史地表的契机。

005